

● 元代別集叢刊 ●

戴良集

(元) 戴良／著 李軍 施賢明／校點

國家十一·五重點規劃項目
國家古籍出版基金資助出版

吉林文史出版社

● 元代別集叢刊 ●

戴良集

(元) 戴良／著 李軍 施賢明／校點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戴良集 / (元) 戴良著 ; 李軍, 施賢明校點. — 長春 :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9.12

ISBN 978-7-5472-0163-3

(元代別集叢刊 / 李 軍 主編)

I. ①戴 ... II. ①戴 ... ②李 ... ③施 ... III. ①古典詩歌—作品集—中國—元代
②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國—元代 IV. ① I214.7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0) 第 028755 號

Dailiang Ji
書 名 戴 良 集
著 者 (元)戴良
叢書主編 李 軍
校 點 李 軍 施賢明
責任編輯 徐 潛 張雪霜
封面設計 柳甬澤
出版發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 址 長春市人民大街4646號
網 址 www.jlws.com.cn
印 刷 長春市華藝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 本 720毫米×1000毫米 16開本
印 張 30
字 數 550千字
印 數 1-1 000冊
版 次 2009年12月第1版 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價 95.00元
書 號 ISBN 978-7-5472-0163-3

本書為國家『十一五』出版重點規劃項目，受到國家古籍出版基金資助

本叢書為北京師範大學『二一一』三期重點科研項目《元代古籍集成》的子課題

項目主持人：北京師範大學古籍與傳統文化研究院 韓格平教授

《元代別集叢刊》編委會名單

叢書顧問：李修生 楊 鐮

叢書主編：李 軍

叢書編委：李 軍 李 鳴

邱居里 周少川

張文澍 鄧瑞全

韓格平 魏崇武

羅 超

《元代別集叢刊》序

一九二三至一九二七年陳垣先生的《元西域人華化考》發表，文章不僅對這一元史上極重要而前人未曾留意的課題作了充分研究，而且對元代文化進行了全面論述，他說：「『儒學、文學均盛極一時。』」但是長期以來，對元代文化、文學的評價，由於種種原因，却仍有歧義。元史研究一直是很有成績的，關於元代各民族文化交流與中華民族文化的發展的研究也有不少進展，但一些成果似也沒有及時為文學學科吸納。文學方面，元曲是顯學，其他文學形式的研究則相對薄弱。

元代詩文研究，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逐漸受到一些關注。在這樣的背景下，北京師範大學古籍所一九八七年下半年，經所內同仁的討論，初步確定以元代文獻整理和元代文史研究作為研究重點。一九八八年十月，向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與研究工作委員會提出編纂《全元文》的立項申請，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與研究工作委員會專家評審組，經研究建議先進行元人文集的普查工作，批准了《國內所藏元人文集版本目錄》的立項。一九九〇年十二月，我們對於元人文集的普查工作告一段落後，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與研究工作委員會正式批准《全元文》立項。在申請和討論立項的過程中，我所同仁和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與研究工作委員會項目評審組的專家，有一個共同的擔心，人們有一個共同的估計，《全元文》的分量與其他同類總集比較不是最大，但是難度是最大的。當時白壽彝先生就說：「元史素稱專門之學，對語言、地理、疆域、民族及其他有關的文獻知識所需甚廣，而我們在人員、資料方面又比較缺乏，困難是不容低估的。」當時元人別集的整理本只有幾部。我們所同仁是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開始編纂工作的，幸虧這項工作得到了元代歷史、文學學界的師友給予多方面的支持，幸虧我們的同仁在困難的情況下堅持工作（包括前後期工作共經歷了十八年），《全元文》才得以完成。還應該說明，這可能是本世紀初最後一項用剪刀加漿糊舊式工作方式完成的一部總集整理項目。

《全元文》出版後，我們進行了總結，檢查了誤收、重收、漏收的情況和收錄文集的情況，並且向同行師友收集了意見，初步議定下一步整理與研究的設想，一方面，準備編寫《全元文補正》，編輯成書，或出版《全元文》修訂本。當然，這需要一定的時日；一方面，準備整理元人別集，出版一套五十家或一百家的《元人別集叢書》，這同樣是一項十分艱巨的任務。

元人別集與明清兩代比較是少得多，明人別集有近萬種，清人別集在五萬種以上，但也有可觀的數字。根據蕭啟慶先生估算，

元代儒戶可能有十萬餘戶^{〔三〕}。編籍在其他戶類的以及道釋也多有文化水平。可以說有條件編輯自己詩文成集的人，不在少數。元吳澄在《張仲默詩序》中說：「近世之爲詩者不知其幾千百人也」^{〔三〕}，也可以證明。編纂《全元文》過程中，我個人經眼的元人別集序、引、題、跋，約有一千二百篇左右，別集應在千種以上。清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收錄六百七十餘種。《全元文》收錄文作者三千一百餘人，文章三萬三千餘篇，文集詩文集二百種以上。《全元文》出版後不久，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楊鐮先生主編的《全元詩》也已完成。楊鐮先生主編的《全元詩》於二〇〇二年正式立項，實際工作已經二十多年了。《全元詩》共收錄詩作者五千二百餘人，詩作近十四萬首，其中收錄詩集在三百種以上。

說到元人別集的問題，這裏不能不回到一個老問題上，元代的起訖點和什麼人可以列爲元人？宋濂修《元史》，起訖爲元太祖元年至朱元璋建立明朝，即：一二〇六——一三六八年。韓儒林先生主編《元朝史》亦同。我們編纂《全元文》時，就《全元文》的收錄原則請教啓功先生。啓先生說：「從道理上講，凡生活於元代，在元代寫有文章的，都可以收錄。宋金兩朝的人，凡是入元，死於元朝的人，都可列爲元人，如牟巘，前人習慣列爲宋人，實爲元人，有趙子昂的墓誌爲證。」由元入明，在元朝寫有文章的，也可以收錄。我們當時爲了與《全宋詩》、《全宋文》、《全金文獻》、《全明文》等總集的編纂工作協調，對於收錄的範圍自我設定了一個時限。現在看來，不一定合適。由於傳統的看法存在某些偏見，一些由宋金入元，由元入明的人，多不列爲元人，對於這類情況，還需要研究。由於看法不同，數字就會有較明顯的不同。但無論怎樣計算，元人別集的數量應在三百種以上是毫無問題的。

斷代詩文總集的編纂完成，對於那一朝代文史研究的作用是大家公認的。但斷代詩文總集的編纂不能替代別集的整理，而況《全元文》、《全元詩》編纂時，別集的整理也剛剛起步，目前已整理的別集還是少數。不少出版界的朋友已經注意到這一點，有一些出版社已開始策劃這方面的項目，有的別集已有整理本出版，我們《全元文》編纂的參加者，也已參與了這方面工作，參與整理之後，更感覺到別集整理的迫切性。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吉林文史出版社與我們一起提出了編纂這套《元代別集叢書》，並希望有一定規模。

從三百種以上的別集中，選出五十種有一定代表性的別集，經過整理編成一套叢書，是編纂這套書的初步的目標。只要求一定的代表性，不要求重要別集盡數收羅在內，因爲有的集子不一定在這段時日內能够整理出來，有的集子國內同仁已經出版整理本，我們《全元文》的參加者和合作的朋友僅就我們的能力所及完成這方面的部分工作。根據古籍整理工作的要求，我們要求收入叢書的每部別集均應選擇收錄較全，錯訛較少的版本作底本，做好輯佚、校點工作；每部書都有前言和附錄。前言介紹作者生平、思想、詩文成就，以及版本流傳情況；附錄收錄作者傳記、唱和作品、詩文評以及別集收藏情況等相關文獻。

古籍整理是一項相當艱苦的工作，高等院校教師一般都承擔着比較繁重的教學與科研任務，在目前的考評體系中，古籍整理

成果所占分值不高，因此，參加這項工作的老師們還是需要一點精神的。當然，這並不是降低對於我們的要求，叢書第一批書即將出版，我們期望國內同好的批評，更期望更廣泛的合作。元人別集的整理工作剛剛開始，我們相信這方面工作將逐步得到開展，以適應元代文化研究和當代文化建設的需要。

李修生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立冬、日寫於懋堂

注释

〔一〕陳垣《西域人華化考》卷八《總論元文化》，一九二七年《燕京學報》；一九三四年勵耘書屋原刻本；《勵耘書屋叢刻》上冊，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二年重印。

〔二〕蕭啟慶《元代的儒戶：儒士地位演進史上的一章》，《元代史新探》，臺灣新文豐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三〕《全元文》十四冊二六五頁，鳳凰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版。



《元代別集叢刊》編纂規劃及凡例

編纂規劃：

收錄範圍：本叢書收錄元代有代表性的、有影響的作家詩文集五十種。

收錄原則：以作者為單位，各自成冊；傳世兩種別集以上的作家詩文，均按一種成冊，歸於該作者名下；所收限於詩文作品，單行的詞集、曲集不收，但原集中已有的則收錄；筆記及經書註釋，原集中已有的也不收錄。

編輯原則：甲：尊重底本，基本依底本順序編排；乙：校點者根據文體自己編排；主要按甲類編排，個別特殊者可按乙類編排。

整理方式：本叢書的整理方式為校勘、標點、輯佚。

書名確定：統一以元人名加『集』字組成，如《張養浩集》。

凡例：

一、叢書每種別集採用錯訛最少、收錄較全的善本、足本為底本，以不同源流的他本為校本，以源流相同但經過前人校勘或修訂的版本為參校本。底本卷首原卷數保留，正文不分段。

二、一作者有兩種以上文集傳世者，按下列原則處理：

（一）兩文集所收詩文大部分為不相同者按兩集收入，前集收全，後集重複者存目；三集、四集依此類推；

（二）兩文集所收詩文大部分為相同者選較全者一集收入，此集無、他集有者附收於此集後；三集、四集依此類推。

三、底本確實有誤可據他本校改者，改正並出校記；底本、校本皆可通者出異文校記；底本不誤、他本誤者不出校記；無版本依據但確有疑義的可出待考校記。

四、原書之古今字、通假字，一般不作改動；異體字、俗體字、簡化字改為規範的繁體字；筆畫小誤、顯係誤刻或古人原不區分如『己、已、巳』者可徑改；凡原作者所用避諱字，一律仍舊，惟缺筆者補足；後人避本朝諱所改者，盡可能改回，並加說明。



五、遵照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國家技術監督局發佈的國家標準《標點符號用法》進行標點，其中書名用書名號「《》」，人名、地名、書名不用波浪綫或下橫綫；文中對話可明確括引的用冒號、引號，不明確的不用引號；引錄前人文章可明確括引的用引號，不明確或僅撮述大意的不用引號。

六、原集底本無、他本有之詩文，作爲「補遺」置於底本正文後。

七、叢書要求對所收作者的集外詩文作輯佚，輯佚範圍包括總集、類書、碑誌和相關方志，佚詩佚文置於正文之後，以與全集相吻合的順序編排，且均需標註出處。

八、原集所有附錄保留，並適當增補，統一編排；附錄內容為：作者傳記材料、來往唱和詩文、相關詩文評論、有關序跋及書目題跋等。

九、每部書包含下列內容：

- (一) 總序
- (二) 凡例
- (三) 前言
- (四) 目錄
- (五) 正文
- (六) 輯佚
- (七) 附錄

前言

元末的江南地區，義軍蜂起，戰亂頻仍，各路兵馬東突西攻，南下北進，征戰殺伐，忙得不亦樂乎。在南宋覆亡僅八十多年後，江南又一次陷入到改朝換代的動盪之中。在這亂世裏，堅守儒家傳統的文人士大夫，不可避免地發生了政治上的分流。一部分人審時度勢，待機而動，加入日後坐擁天下的朱明政權，而成為開國文臣；一部分人隱居避世，與義軍隊伍和元明兩朝政權都保持距離，最後優游江湖以終，還有一部分人繫念元朝，不與朱明新朝發生任何關係，在吟詠山水中寄托自己的故國之思。這最後一部分人，即後世所稱的『遺民』，戴良就是在這易代之際，『遺民詩人』的一個代表。

戴良（一三一七——一三八三），字叔能，晚號九靈山人，籍籍生，婺州浦江（今屬浙江）人。博學多才，先後從柳貫、黃潛、吳萊學文，向余闕學詩，於經學並有涉獵，旁及天文地理、醫卜佛老之書。至正二十一年（一三六一），以薦授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儒學提舉，次年赴吳中任。四年後自浙江浮海北上，時在至正二十六年。一年後南還，朱元璋軍隊已佔據東南，他隱名避地浙東，直至洪武十五年（一三八二）。這一年他被徵至金陵，因辭官忤旨入獄，次年死於寓所。著有《九靈山房集》三十卷，今傳。又著有《春秋三傳纂玄》、《治平類要》等，不傳。《列朝詩集小傳·甲前集》、《明史》卷二八五《文苑傳》、《元詩選二集》辛集、《新元史》卷二三八均有其傳略。

根據戴良一生行蹤，我們可將其生平分為三個時期：鄉居學習時期，吳中仕宦時期，鄭越避隱時期。

第一時期，鄉居學習時期。

戴良從出生到至正二十二年任職吳中，基本上是在家鄉度過的。

戴良的家鄉婺州金華，是著名的南宋理學金華學派的發祥地。自南宋的呂祖謙、王柏、何基、金履祥，至元代的方鳳、許謙、柳貫、黃潛，直到明初的宋濂、方孝孺，這一學派代有傳人。戴良年輕時從學於柳、黃等人，『朝論夕講，日探月索』^{〔一〕}，後人對他也多有『先生理學繼濂洛』^{〔二〕}、『著述能將濂洛追』^{〔三〕}這樣的讚語。但從戴良現存文集來看，其於理學並不太熱衷，但他鑽研『六經』而得其作文之法，卻頗能得柳、黃師承，揭泓總結云：『蓋其典實嚴整，則得之於柳先生者也；縝密明潔，則得之於黃文獻公者也。』其後戴良又學詩於余闕，『其詩則詞深興遠，而有鏘然之音、悠然之趣，清逸則類靈運，明遠，沉蔚則類嗣宗、太沖，雖忠宣公發之，而



自得者尤多」^四。戴良生學術之鄉而不以理學名家，然其寫詩作文，處處以學術為根底，則仍能看出家鄉學術氛圍和前輩先賢對他的影響。

浦江戴氏為縣之望族，戴良曾祖、祖父及父親三代雖未作官，但樂善業儒，以忠孝持家。戴良天資聰敏，自幼因母親身體不好而由姐姐照顧，八歲時姐姐出嫁，攜戴良同行。夫家趙氏為宋室宗親，戴良在此居住生活，從師問友，讀書向學，直至成年。成年後戴良又娶了姐夫的妹妹為妻，戴、趙兩家可謂淵源甚深。戴良對姐姐始終懷有感恩之心，姐姐去世時，戴良服喪期年。

戴良早年研治經學，習學子業，從他後來著有《春秋三傳纂玄》來看，其所治當為《春秋學》。自元統二年（一三三四）到後至元六年（一三四〇），元廷停辦科舉，戴良棄舉子業不為，此時已入柳貫門下。戴良父戴暄與柳貫是好友，戴良尚未成年就奉父命從柳貫學習。柳貫是文章大家，他曾從金履祥治經學，從方鳳、謝翱、吳思齊學詩文，並曾向深諳史學的牟應龍求教，是一個飽學宿儒，與虞集、揭傒斯、黃潛並稱為「儒林四傑」。戴良雖也游於黃潛、吳萊之門，但從柳貫最久，跟柳貫的感情也最深。柳貫去世，戴良曾經紀其家，訓育其子孫，持心喪三年始歸。其《祭先師柳待制文》云：「良也登門，幾年於茲，肇自童蒙。月夕風晨，婆娑誘掖，猶記德容。教我食我，戒我勸我，在麻之蓬。」^五並曾在《墓表碑陰記》中，深情回憶當初寒冬之夜留宿柳貫家中，柳貫與他擁衾相語的細節。戴良也沒有辜負柳貫的厚待，先師死後，他與同門友宋濂編輯柳貫《待制集》二十卷、《別集》二十卷，為柳貫詩文的傳世竭盡心力。

後至元四年（一三三八），戴良任月泉書院直學^六。直學，官名，為書院掌管錢穀之人。

至正九年（一三四九），時任浙東廉訪司僉事的余闕巡視所部，過浦江，戴良欲拜其為師，未獲允許。第二年，戴、余二人再次相見於婺州，相與討論作詩心得。余闕非常高興，對戴良說：「士不知詩久矣，非子，吾不敢相語。」余闕不僅盡授其所學，還為戴良的《天機流動軒》題寫匾名。余闕是元末死節的著名人物，八年後，他堅守安慶，待援不到，城破殉國而死。余闕的政治才幹、經學修養和詩才書藝，都給戴良留下深刻印象。在余闕題匾後，戴良遍邀好友為此題寫贊記。先是宋濂題贊，其後陳樵、胡翰、王禕、鄭濤都分別為此《天機流動》作記。戴良並將這些文字刻置軒壁，而《公（余闕）所書親蹟及四君記文搨本》盡貯之行囊，隨身攜帶，可見他對此的珍愛。其後三十年間迭經兵火，洪武十五年（一三八二），戴良「以垂暮之年歸視故居，軒雖苟完，而壁間舊刻無復存者」^七。其時除鄭濤外，其他五人均已不在人世。戴良將「四篆四記聯之為卷」，並因此作《書天機流動軒卷後》，文中充滿了滄桑之感。

至正十二年後的江南，處於元軍與農民義軍的征戰割據時期，各路消息不斷，戴良此時避兵山中。從《山居稿》中收錄的作品來看，戴良的政治取向很明顯，就是支持元軍的平叛，如《平饒信詩》、《邁里古思公平寇詩》、《送人從戎》、《送人赴辟》、《送人還

鎮》、《投同僉公》等。也有一部分詩抒發了他與友人的離情別緒，如《別宋景濂》、《寄王子充》、《送人還蕪湖》、《贈別祝彥明》、《避地二首》等。

至正十八年十二月，朱元璋軍取婺州，改婺州為寧越府，以王宗顯知府事。王宗顯是一位博涉經史的儒者，與戴良關係很好。第二年，王宗顯開辦郡學，戴良受王守之聘擔任學正。除戴良外，葉儀、宋濂被聘為五經師，吳沉、徐原等為訓導。『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聲，無不舉手加額』[△]。戴良的《山居稿》中如《郡齋守歲》、《郡齋夜飲》等詩，即是反映他在郡學的生活的。不久，王宗顯卒於官，戴良也卸職而去。

至正二十一年，戴良被舉薦任奉訓大夫、淮南江北等處儒學提舉。此為學官，任職地為張士誠佔據的吳中。此前四年，張士誠降元，元以為太尉。則此時戴良之任命，亦是出於元廷。戴良於第二年赴吳中，從此開始了他的吳中仕宦時期。

第二時期，吳中仕宦時期。

戴良在吳中，生活相對比較穩定，他把妻子接來，很難得過了幾年相對安逸的日子。更重要的是，他在這裡結識了不少新朋友，陳基即是其中重要的一位。陳基（一三一四——一三七〇），字敬初，台州臨海（今屬浙江）人。此時陳基在張士誠的太尉府裏任參事，飛書走檄，碑銘傳記，多出其手。至正二十三年，張士誠稱『吳王』，別人皆慶賀，獨陳基諫止，差點丟了性命。戴良的《吳遊稿》中，有不少是與陳基相約出遊、賦詩唱和的作品。至正二十四年，戴良為陳基編次詩文稿，成三十五卷，並親為作序。序中大略回溯了自先秦至宋末散文遞變的歷史，然後以大段篇幅對元代散文的興盛及各大家的特點作了揭示與總結，其中貫穿的重要觀點是：『世道有升降，風氣有盛衰，而文運隨之。』^九這篇序，很明顯地具有為一代文運進行總結的意味，可以看出戴良對自己所肩負使命的自覺認識。其後在避居鄭越時，他為丁鶴年詩稿所作序中，也明顯地具有這種總結的意識。

張士誠雖是鹽徒出身，但比較注意網羅文人，他所佔據的吳中又是經濟富庶地區，因此這裡曾被營造出一個生活安逸、文學興盛的綠洲。但好景不長，在張士誠稱『吳王』的這一年，朱元璋敗陳友諒，次年，朱亦稱『吳王』，並全部佔有原陳氏地盤。其後，西吳軍隊劍矛東指，吹響了與張吳政權決戰的號角。至正二十六年，在高郵、泰州等原張吳政權的地盤漸次被朱元璋軍隊佔領後，作為張氏大本營的平江地區，已明顯感受到了朱元璋咄咄逼人的攻勢，綠洲已不復存在。在這一年的春天，戴良買舟東下，離開了吳中。

戴良離開時並未攜家眷，其夫人、二子及新納的李氏妾均滯留吳中，僅一姪與他同行。春發吳門，經錢塘，過富陽，及湖源，欲歸家省墓，因干戈阻隔而不得，數月後來到浙東。浙東並不是他此行的目的地，重陽節過後，他自此登船浮海，北上山東。其時中



原干戈擾攘已十幾年，陸路早已不通，南北交通，僅能依靠海運。戴良此次浮海北上，其目的，滯留北地時間及同行情況，戴良自己的表述均模糊迷離，自相牴牾，故頗費後人周折。先說同行情況，戴良多在文中說他是「挈家浮海」，錢謙益、朱彝尊、顧嗣立、四庫館臣、潘錫恩等人在為戴良作傳記時均採此說。清乾隆時戴氏後裔戴殿江等人為戴良作《年譜》^{〔五〕}，澄清了這一問題，其「（至正）二十六年」條云：「發吳門時，夫人、二子尚留吳中。六月，治李氏喪，七月，還錢塘，次年，至浦邑新居。所挾以從游者，惟兄子原直耳。公自謂『挈家浮海』者，亦託辭也。」^{〔六〕}再看滯留北地時間，錢謙益、朱彝尊、四庫館臣等均未明確言其北上時間，僅云「張氏將亡」、「見士誠將敗」或「知士誠不足與謀」。黃宗羲及戴殿江最先將其北上定在至正二十六年，見戴氏所作前、後《年譜》。錢、朱等人又言戴良洪武六年南還，後世多沿此說，以致一誤再誤，也是戴殿江等人對此最先予以匡正。前《譜》除了將其南還置於至正二十七年以外，其「（洪武）六年癸丑」條又云：「《趙君夫人墓誌銘》云：『洪武三年，趙君夫人卒。後二年葬，又一年，仲弟良始克回自東海，望墓門而哭。』《明詩綜》^{〔七〕}據此以為洪武六年泛海南還，《明史》亦然。今考先生詩『十年東海上』，『年離東海郡』諸言東海者，皆指鄭言。自鄭還浦，故曰『回自東海』。『我遊何處所，北海乃其地』，乃指山東益都言耳。洪武初年在鄭諸作確有可據，故言『六年南還』者誤也。」^{〔八〕}所論確鑿，糾正了「洪武六年南還」之誤^{〔九〕}。最後再來看此行目的，以上所舉各小傳，均言其北上為投攬廓軍，即元軍將領王保保的部隊，及聯絡山東豪傑，「奮欲有為」。這主要也是沿襲錢謙益的說法。從大方向上來說，這一推測是有道理的。但是戴良此行有沒有更具體的任務，其北上細節是怎麼樣的，這是留給後人的疑問。黃宗羲首倡「乞師」之說，即戴良北上是為了向北方的元軍將領請求武力支援，這與錢的說法並無大的衝突，只是更具體和更明確而已。關於戴良此行目的，現存文獻提供的信息很少。從戴良文集中心星星點點透露出來的消息看，戴良北上的目的是京師，南北陸路既不通，北上京師也必須走海路。到達山東後，西去京師的道路因軍閥混戰又被阻隔，戴良滯留山東一年。在這一年中，他的「歸我王相」的設想恐也不如意，更重要的是南方的局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詳見本文下面論述《年譜》一節，此不贅），因此次年秋後，他仍從海路返回浙東，開始了他生平的第二個時期。

第三時期，鄭越避隱時期。

戴良再次回到浙東時，江南已是物是人非。這一年七月，明軍克平江，滅張士誠，吳亡。盤踞浙東的方國珍，不久也歸降朱元璋，江南領土大半已改換旗幟。第二年，明軍攻破大都，元順帝北走應昌，元朝滅亡。

戴良南還後，變姓名為「方雲林」，除了偶然一回浦江外，先後隱居於鄭縣、餘姚、慈溪等地，館於人家或寄身僧寺。《九靈山房集》中雖有「鄭遊」、「越遊」二稿，但何時在鄭，何時在越以及具體居住地點，則難以確指，誠如《年譜》所云：「公居越，無的年可

指。《越遊稿》中《移居》、《飲酒》諸詩，亦多在鄞所作。蓋慈、姚接壤，來往頻仍，原不能確指何年也。」^{〔十五〕}

趙友同《墓誌銘》云：「四明多佳山水，耆儒故老，往往流寓於茲。先生每相與宴集為樂，酒酣賦詩，擊節歌詠，聞者以為有黍離麥秀之遺音焉。」^{〔十六〕}戴良《自贊》亦云：「處榮辱而不一，齊出處於一致，歌黍離麥秀之詩，詠刺水殘山之句。」^{〔十七〕}這一時期，「黍離麥秀之遺音」成為他詩歌的主調。這種主調首先表現在他那些感慨故國興亡的詩篇中，《秋興五首》、《懷宋庸庵》為其代表，如「俛首風塵秋有淚，側身天地老無家」，「王侯第宅蒼茫外，錦繡山河感慨中」，「隴雲秦樹空今日，衰草斜陽異昔年」，「周室舊聞遷寶鼎，漢宮今見泣銅盤」，「為歎興亡腸易斷，不須登眺傍高寒」，「海流不盡衰年恨，節序祇添故國心」^{〔十八〕}，「麥秀歌殘已白頭，逢人猶自說東周。風塵瀕洞遺黎老，草木凋傷傷國秋」^{〔十九〕}等，眷懷故國，悲涼慷慨，明顯有杜甫《秋興八首》、《詠懷古跡五首》的痕跡。再如卷十五《近觀以大鶴年和韻諸詩因借韻呈二君子併述己志云爾三首》：「輝輝淩霜葉，歲暮靄顏色。宜哉固窮士，秉心如鐵石。」（其一）「彼道政多岐，我心非轉石。遙途寄孤蹇，衡茅守虛寂。」（其二）「以淩霜葉作比，表達自己『寄孤蹇』『守虛寂』，不為回改的『鐵石』之心。卷十七《歲暮偶題二十二韻》：「削迹邊山邑，投身傍海城。驅馳悲世事，出處愧家聲。」乾綱遭久紊，坤軸值旋傾。朋舊千家淚，妻孥兩地情。」紀晉慚陶令，依劉誤禰衡。」既悲乾坤驟變，故國淪亡，又哀嘆世事難料，自己不得不隱姓埋名的境遇。再如卷十五的《雉子班》，明確表明自己隱名避世，「寧判帶箭死榛莽，不肯為裘奉聖明」，「宜哉避世士，往同雉子逃其形」的堅定意志；同卷的《城上烏》則感嘆「烏將北遊，難莫與俱」，明顯寓有眷念北上之元的含義。其次是感傷自己的身世，懷念故鄉親人。這一類的詩最多，如卷十五《門有車馬客》、《鴻雁生塞北行》、《感懷十九首》之十六、卷十七《客中守歲》、《自述二首》、《歲暮感懷四首》、《辛亥除夕三首》等。在這些詩裏，滿眼所見是「空」、「老」、「稀」、「孤」、「落葉」、「白頭」、「遠鶴」、「索居」等字眼，如「寂寞唐朝寺，頻年客到稀。空山孤殿在，荒徑一僧歸」^{〔二十〕}；「攜家東海上，三載滯還期。髮為多憂白，身緣久病衰」^{〔二十一〕}；「百年世事醞雞變，一夜鄉心謝豹啼。却向歸途望遠鶴，白頭和淚寫淒迷」^{〔二十二〕}。這種身世之感在卷十七《憶鶴年有賦》、《旅懷五首》等詩中也有強烈的流露。這一時期戴良還寫了大量的「和陶詩」，存世有五十一首，另有一首辭。恥事異代，遠離官場，不隨時俯仰的陶淵明，是詩人這時的精神支柱。陶詩的悠然恬淡，使詩人面對艱難困苦時淡定從容，在「和陶」中澄淨心慮，升華境界。謝肅為戴良的《和陶詩》作序，將看似忘懷世事、委身世外的陶淵明，比之與不忍宗國危亡的屈原、鞠躬盡瘁於復漢大業的諸葛亮相等，然後說戴良「其豪放之氣、猛烈之志，寓於高雅閑澹之辭，足以使人嗟嘆咏歌之者，不但與靖節異世同符，而《離騷》之怨慕、《出師表》之涕泣，亦莫不具在其間也」；認為「當與陶詩並傳於後無疑矣」^{〔二十三〕}，給與了很高評價。

戴良這一時期的文章，以為友人寫的贊銘箴說、序記碑傳及祭文為多。在遠離親人故鄉的客居歲月裏，與朋友相聚，是他最大的快樂。但即使在為友人題畫作記或作序時，他仍念念不忘於故國之亡和去就之擇。如《百猿圖記》一文，作於他從山東南還之後，文



中以四川之猿與東海之猴作比，借猿思元，寓意非常明顯，顯然應該是元亡後的抒懷之作。黃宗義為《百猿圖序》作跋云：「此以猿比元，以猴比明。此時元尚有四川，而明之發跡在東海，故云。」^{〔三十四〕}再如作於洪武元年（一三六八）的《東山賞梅詩序》，文章先讚賞「於窮陰盛寒而不與衆卉爭榮」的梅花「色能受變，香能處清，而操能立獨，有仁人義士之高致」，故能得到諸君子的賞愛，然後話題一轉，「雖然，使其出處去就之際一或有戾，於是梅縱從而賞之，而是梅不為其賞矣」^{〔三十五〕}，與他「和陶詩」中「愁絕舊同袍，學廣未聞道」^{〔三十六〕}、「道喪士失己，節義久吾欺」^{〔三十七〕}的憂慮相同，強調出處去就之際堅守如一的節操，可見這個時候他對這一問題日夜牽念。此後他所結交的人，多是堅持氣節、不奉新朝的逸人高士，如丁鶴年、滑壽、宋禧等。

戴良避隱鄞越的生活持續了十幾年，洪武十五年冬，因有人讖破，戴良被強徵入金陵。次年四月，以不受官職的待罪之身自縊於寓所，時年六十七。關於戴良的具體死因，分別有瘕死、病死和自殺三說，筆者認同全祖望的說法，即「九靈以不肯屈身而被繫，顧其死不甚明。使其出於自殺，固為元畢命；即令以瘕死，亦為元也。九靈之大節，不必果出於自殺，而要可信其為元也」^{〔三十八〕}。也就是說，不管個體生命具體消亡的方式為何，戴良精神層面的取向是毫無懸念的，不入新朝的態度是決絕的，因此仍可以判定他是自絕於新朝。而從《墓誌銘》對他死前境況百般回護來看，他自殺的可能性極大。如同元初的謝枋得，戴良以生命為代價自絕於新朝，堅守住了他作為末世遺民的底綫，這一點，讓歷史記住了他的名字。

戴良生前對自己的詩文已有所編輯，「皆即所遊之地而名焉」^{〔三十九〕}，即根據生活的地域來命名。而其轉徙之地往往與其生活的時段相對應，故各稿亦可視為戴良相應時間段創作的結集。至正二十二年之前，戴良基本在自己的家鄉一帶生活，故這一時期的詩文命名為《山居稿》。至正二十二年，戴良赴吳中任儒學提舉至二十六年，其後北上山東，一年後返回，這一時期的詩文編為《吳遊稿》。南返後他沒有回到家鄉，而是滯居於浙東一帶，直到洪武十五年被迫赴南京才離開，這一時期他分別有《鄞遊稿》和《越遊稿》。四稿的編輯是否全出自戴良手編，不能確定，但他在洪武初曾請謝肅為《吳遊稿》作序，則可斷定有部分稿子的結集，是在他生前就已完成。全集《九靈山房集》的命名也很早，揭泐為該集作序時，首稱「《九靈山房集》者，浦江戴九靈先生所作之詩文也」^{〔四十〕}，其序作於至正二十五年，則此時全集名已確定，應是戴良本人所為。

今傳《九靈山房集》三十卷，是由戴良長子戴禮輯錄成編的。桂彥良曾為編好的全集作序，序云：「先生之子禮，輯錄成帙，辱以相示。」^{〔四十一〕}編好的全集一直藏於家，未能得到刊刻的機會，直至明正統年間，傳到戴良四世從孫戴統手裏，其集才被刊刻出來^{〔四十二〕}。據戴統跋，除戴禮外，其父戴侗（號純素處士）也參加了編校：「《九靈山房集》凡三十卷，吾曾叔祖提學公之所作，叔祖司訓公、吾先人純素處士之所編校者也。」^{〔四十三〕}今正統刻本各卷首下題「男戴禮叔儀類編，從孫侗伯初同編」，即可證。戴侗在世時即有將此集鋟梓想法，但二子相繼去世，竟未獲成功，「齋志以歿」。戴統繼承父志，於正統九年（一四四四）開工付梓，一年後完

成，是為明正統本。正統本今傳，國家圖書館有藏，民國時張元濟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本影印人《四部叢刊初編》。正統本《九靈山房集》凡三十卷，分別由《山居集》七卷、《吳遊集》七卷、《鄧遊集》九卷、《越遊集》六卷和《外集》一卷組成。卷首有揭沄、王禕兩序，卷末有桂彥良序和宋濂為揭序所寫的《題九靈山房集》。每《稿》前有目錄，正文後有戴統跋。前二十九卷收戴良詩文，其中詩三百八十八題五百八十六首，文二百七十二篇，《外集》一卷收錄時賢的頌贊十九篇、祭文一篇及趙友同所撰《墓誌銘》。國圖藏正統刻本為張蓉鏡藏書，曾是毛晉汲古閣故物，分別有黃丕烈、孫原湘、張蓉鏡手跋。正統本為初刻本，也是後世諸多刻本的祖本。

戴統等人的努力，使戴良遺集得以流傳，確是大功一件。可惜時間不長，板燼於火。康熙末年，有張哲、張以培父子再次刊刻，名為《九靈山房遺集》，是為清康熙本。張氏父子未得見正統本，而是以自己搜輯所得，交付傅旭元刊刻，故康熙本僅收戴良詩二百六十六首，文五十八篇^{〔三十四〕}，僅及正統本十之三四。不僅數量少，質量也較差，為此本作校勘的曾安世頗多感嘆，以致懷疑刊刻時未經張氏父子所寓目：『吾所致疑於非竹城原編者，詩文序次，非編年則從類，乃殊不解乎其雜亂而無章也。題曰《浦陽五賢贊并序》矣，何以存序而刪贊，反留他人之書後也。《浦江修學記》，何以去『泮水之詩』以下五十七字也。任繕者、刊者之誤置《容齋說》二行於《題樓彥英詩卷後》，錯易《詠雪》章「林寒催雀聚，簷白誤雞鳴」於「浪走兒應喜，狂號犬自驚」之上。漫不一檢，而令讀者目瞽舌橋而不能下矣。愚谷、竹城好學讀書，不應有此，而況乎錯謬踵出、標古為律之紛紛也，豈刊成而愚谷父子未一寓目耶？』^{〔三十五〕}康熙本僅五卷，清乾隆編四庫全書，同時收到全集與此本，全集入正編，此本列入《存目》。康熙本今僅見南圖收藏^{〔三十六〕}，不易得見，所幸清末胡鳳丹輯編《金華叢書》時收入，又入《叢書集成初編》，後人得以窺見其貌。胡鳳丹有《九靈山房遺集序》，云：『浦陽戴叔能先生所著《九靈山房集》，余於庚午春已重鋟之，而《四庫存目》稱先生有遺集五卷，余以未獲其書為憾。壬申冬，幸購是編，如得異寶，即以授梓。』蓋康熙季年其邑人張竹城明經所蒐輯，秀水曾安世司鐸浦江時所校正者……雖殘膏賸馥，正集之所不載，然以先生之介節，後人得其隻字，且宜寶貴，以永厥傳，況其哀然成集如是之繁富者乎！』^{〔三十七〕}胡氏謂『雖殘膏賸馥，正集之所不載』，所云不確，此五卷所收詩文，均見於三十卷正文，故四庫館臣將其置於《存目》是有道理的。

到乾隆時，正統刻本因刊刻後不久板燼於火，故流傳不廣，不少藏書家賴借抄收藏，數量、質量皆不如人意的康熙本也難覓其蹤，故戴氏後裔有重刻是書之議。先是，戴良十四世從孫戴殿江、殿海、殿泗，為搜輯先人遺集和豐富自家藏書，囑書賈為之留心，意外得知鮑廷博藏有《九靈山房集》三十卷抄本，遂購置家藏^{〔三十八〕}。乾隆三十六年（一七七二），殿江兄弟始刊刻此集，除據鮑氏抄本外，又借得汪氏抄本、黃宗義手抄選本。書開始刊刻後，續得嘉興曹氏正統刻本，「乃慎相校讐，疑者仍之，復是正於杭基浦太史，再三反復，始克就梓」^{〔三十九〕}，是為清乾隆本。此本吸收了鮑廷博、曹溶等著名藏書家的校勘成果，又經過杭世駿的訂正，因此質量較好。戴殿江等人謹慎校刻，盡量不改動原書編次：『原編自《山居》迄《越遊》，詩文類次，時地皆可尋按。目錄與題文少異